

文章编号:1674-8107(2021)01-0040-09

对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诸种误读辨析

王增智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用西方自由市场的逻辑思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诸种误读,如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国家资本主义论、融合论、“第三条道路”论、“后社会主义”论等。这些论述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澄清这些错误观点,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尤为重要。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量的资本还在被利用、资本逻辑也有所扩张,但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利用资本在达到自我否定的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段长期的历史过程,应有一个正确理解。

关键词: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误读;解析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1.01.006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的崛起令世人瞩目。因改革开放而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国外政界和学界言说的热点话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使他们迷惑不解,他们试图用西方资本逻辑解读中国故事,致使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误读至深,甚至影响到国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新征程上,有必要梳理西方某些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以廓清其负面影响,这对营造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良好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国外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观点

因改革开放而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焕发出蓬勃生机,走出了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

的别样道路。40 余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人均 GDP 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 1/3 的贫穷落后国家,迅速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国内外危机和挑战的冲击和压力下还能持续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这不能不让世界称奇。于是,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立足于西方立场开始瞪眼看中国,他们用分析西方国家发展的概念工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远距离”探测,特别纠结中国的崛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其主要观点有:

1.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这一观点的重心不在中国特色,而在资本主义。持这种观点的西方人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面子上的称谓而已,其里子却是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特色产物。他们甚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归到与撒切尔、里根、戈尔巴乔夫

收稿日期:2020-09-20

作者简介:王增智(1973-),男,湖北随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

等新自由主义政治家行列,试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涂上西方资本主义色彩。其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改革和90年代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并“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1](Pxi)]另据调查,有大约60%的美国左翼学者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2]如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使中国“导向了一种日渐分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3](P34)]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乔尔·安舟认为,中国的改革使“社会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以,中国经济已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也必然变成资本主义性质。”^[4]美国《每月评论》杂志曾刊发多篇文章指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日本许多学者在谈到中国经济性质时也认为中国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系列,且今后还将继续向资本主义道路前进。^[5]

2.国家资本主义论。这种论点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比较流行。其代表人物美国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扮演经济主角并主要为牟取政治好处而利用市场的体制。”^[6]同时,他还在其新著《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和其他一些集权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首要领导者,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并称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威胁”。^[7]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是因为国家强大的干预作用,形成了一种“指令性资本主义”。^[8]

3.融合体论。法国学者罗兰·列夫在《中国活力的秘密武器》中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民族主义变种的混合物^[2];波兰科学院院士、东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亚当·沙夫认为:“由于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只能说当前中国的制度是一种混合型制度。”但“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都不能说今日中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增加——虽然地区间千差万

别。”^[9]美国普渡大学洪朝辉教授认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10]

4.“第三条道路”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文章中认为,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但它既不会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民主与自由市场”,也不会“退回到毛主义”和“利用过去服务现在”,它基于传统基因只能走“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11]

5.“后社会主义”论。本文所言的“后社会主义”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原苏联模式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改革进行反思的“后社会主义”概念,而是特指美国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所用的“两可性”特征。德里克教授在《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后社会主义”之“后”是特指今天中国社会历史形势的“两可性”(ambiguities):“一方面因为中国虽然断言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已不再从固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动力;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可供中国选择,只要形势需要,中国就可能再回到社会主义。”同时,这种“两可性”还体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却逐步获得了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势地位。”^[12]

二、对上述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观点的解析

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给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正常的社会演进秩序,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某种阶段,资本开始全方位自我否定和无产阶级革命,然后进入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一种是在全球文明成果交流交融可以共享的情况下,特殊的某种文明体(主要是指具有某种公有制

生产关系特征的东方国家)在保留了自身特殊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前提下,吸收了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后(主要是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可以不经对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阵痛而直接迈向更高级社会发展阶段。这就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由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3](P12)},所以在正常的社会演进序列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如:尽管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阶级性的剥削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生产领域就绝对不存在剥削现象了,其他如文化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也还会存在。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具有特殊性,既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而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也没有原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可保留,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但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外,其仍然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的理论逻辑和基本原则。“两个决不会”意在表明社会演进过程中生产力积累的决定性作用;“两个必然”则揭示了社会演进的不可阻挡性铁律。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生产力的积累阶段,又是凸显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比优势的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逻辑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决定了资本逻辑的扩张及对中国的渗透,从而使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资本主义弊端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需要运用国家政权力消除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性剥削关系和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这两大特征体现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就是既要现实生产力总量的增加又要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从实际出发,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把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途径。40余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上实现了吸取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和总体上限制、克服或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弊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并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在时空中同时并存,且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会占据主导地位。时至今日,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遭受诸种危机重创,但资本主义并没有死去,而是通过不断调整 and 改革获得了新生命。这就意味着,两种经济形态与两种制度的竞争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在此种语境下,资本主义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限制、制约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上述各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读,不排除政治上的居心叵测,或是通过学术研究外衣来实现政治企图。

如果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来看,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21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走出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并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样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怀和走自己的路的自信,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都可以吸收为我所用。那种将“自由市场”绝对化,以为“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标配,且在任何时空中都会显示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特征、彰显资本逻辑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真正的“自由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在当今比较成熟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得手”的联动作用。事实上,作为手段的“自由市场”,其性质决定于为谁服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引入、资本的扩张确实使中国城乡、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种变化没有在

中国产生新的阶级性剥削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完全私有化、自由化和放弃国家宏观调控,而是牢牢地将市场交换原则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且禁止其渗透到党内活动中,从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进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

除此之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还存在混淆性质和方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性质与方法的统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属于性质问题,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则属于方法问题。性质只有一个,但方法可以有多种。邓小平曾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4](P236)}这即是说,作为手段和方法的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独有,其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中国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实践,使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综合国力得到了快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这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正确性。

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列宁提出来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念,并非一种经济形态,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成分和经济手段,其意在表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国家作用。一般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政权直接参与并掌控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二是指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根本不存在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存在不受国家“监督和调节”的经济发展。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资本主义代表的美国,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抢眼的,如中美贸易战中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在一种经济形态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运用作为经济成分或经济手段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调控的需要,并非要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1921年的苏联就采用了强化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社会主义的办法,效果显著。为

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通过宏观调控干预经济,是一种“监督和调节”,并非“扮演经济主角”,搞国家资本主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媒体及政客炒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有其深刻动机。一是对中国成就作资本主义辩护。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试图用中国的崛起为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恶果辩护,其目的是要继续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国垄断寡头(尤其是金融垄断寡头)的狭隘利益。二是有意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对中国施压,误导中国国内舆论,削弱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

融合体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非是在拷贝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添加了一些中国元素,并且“资本主义因素在增加”。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确实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资本逻辑也在不同程度扩张,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改变,且在从严治党中禁止将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活动中。亦即,不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有多少不确定性因素,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确定的。同时,在中国目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地位上并非等量齐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毫不动摇的。这种经济制度安排绝不是融合论者所谓的“变种”“混合型制度”和杂交的产物,而是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和激发社会活力的内在需要,并为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所证明是适合中国崛起的基本经济制度。

彼得·诺兰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无法有效地阐释中国故事。因为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来源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来源之一,但不是唯一,且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否则很难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社会主义论断的中国化产物。它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不是教条式套用社会主义理念),又立足于

中国特殊国情;既融汇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本要求,又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照搬,始终对资本逻辑保持应有的谨慎。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既没有走上歪路和邪路,也没有走老路。

阿里夫·德里克用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在吸收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后就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想。这实际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15](P21)}同时,阿里夫·德里克还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两可”中选择的结果:只要有利,既可以选择市场经济,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这虽然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灵活性,但实际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的。40余年来,不管是基本经济制度,还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从未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使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先进经验,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也不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之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实现14亿人的全面小康生活。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三、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是解读这条道路的基本视角。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解读这条道路的核心要点。同时还要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5](P21)}这段话表明了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二是中国的社

会主义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人民意愿,具有中国的特色性。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实践指南。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追求美好社会。中国化意味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应用于中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二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6](P53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了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立足于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又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性”上,这主要是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还都是国别意义上的,特殊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双层内涵:一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而存在;二是作为一种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现实的选择结果而存在。这即是说,在中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内在要求。正是这种内在要求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一般批判审视和发展超越特性,在实践中探索扬弃资本逻辑的中国经验或中国方案。同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又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生成了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赶超情结(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当这种赶超情结内化为一种主体性很强的学习动力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都会成为学习、实践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赶超情结(从“开除球籍”到“现代化强国”)铸就了今天中国的伟业。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意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以俄为师”也没有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和“创造新的理论”,再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得更加精彩。以具体实例说明,如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为世界反贫困作出了杰出贡献:既直接使7亿多人口脱贫,又为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至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中国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如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所言,中国减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实践启示,只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创造出伟大奇迹。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了一种创新性。这种创新性体现在突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独尊局面,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7]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版。从理论上讲,在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学会驾驭资本服务于自己的政权,从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凸显比较优势。从实践上看,正是由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化、中国化用以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方法,才引起了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标配的诸多西方人士的不解或误读。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是全球工业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结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某种共享特征,但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如资本逻辑的任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制度的优越性则可以规制资本逻辑,将其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存在资本逻辑现象并不意味着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之所以没有“变色”,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资本逻辑设置疆垣,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驾驭资本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学会驾驭资本有一个过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将市场交换原则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是为了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弊端,更是为了确保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允许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因为资本在走向全面自我否定的过程中还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即资本还有其被利用的现实价值,但这一价值在当代中国要服务于共同富裕,这是利用资本的底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本被大量利用的现实(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监管等),可能会导致观念上的一些误解。这就需要大力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长线历史观”。只有站在一个比较长线的历史中考察这一现象,才能从理论上得到澄明。

一些西方势力之所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不是因为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中国放弃或背离马克思主义”^[18],是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中国取得的成功是由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优胜于资本主义。这对于西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一些西方人士在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往往有意撇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仅仅从这条道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市场经济取向角度进行阐释,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核心,是他们不能正确阐释这条道路的真正根源所在。中国共产党是运用国家力量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加生产力总量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要有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来举旗定向、凝聚磅礴实践力量,并极力推动实践进程。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变,都与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分不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新路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社会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世界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长达 40 余年的时间内保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且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就把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度发展成一个由“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大国。巨大的成就,不仅昭示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还使改革开放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凡是不符合实践要求的模式和方法最终会被淘汰,创新才是出路。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正确把握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制定了既符合国情又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在产业发展上,还是在货币政策上,中国基本上做到了一切以促进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为考量前提。”^[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典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20](P260)}正因为有了独立思考,40 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目前,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而且 220 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 1.5 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相继问世。2013-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 7 亿多人口脱贫和即将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封闭模式。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就用形

而上学的观点来观察和阐释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结论,否定了矛盾的存在,从而封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窗口,把社会主义变成了固定不变的僵化之物,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没有改变。戈尔巴乔夫主政后,苏联试图打破僵局,但却走上了改旗易帜之路,把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引向了解体。中国“以苏为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仍然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0](P370)}40 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觉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坚决摒弃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摒弃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走“歪路”“邪路”,也不走“老路”,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转变,开辟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行性,大量的实例也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的社会转型。于是,在观念上,一些人习惯于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用现代化的繁花似锦淡化资本主义的血腥味道。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现代化是通过对内盘剥、对外野蛮侵略和掠夺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这个词蕴涵着血腥和罪恶。与之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辟蹊径,对内谋求科学发展,对外谋求合作共赢,通过和平方式开辟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尽管当今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现时代发展乏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点亮了明灯,也必将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参 考 文 献

- [1] 黄亚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M].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
- [2] 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3).
- [3]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M].Monthly Review Press,2005.
- [4] [美]乔尔·安舟.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与剥夺工人.China Left Review 2011(4) ,[EB/OL].<http://chinaleftreview.org/>
- [5] [日]大木一训.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当前经济[N].张利军 编译.社会科学报,2005-02-17.
- [6] [美]伊恩·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J].张文成 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5).
- [7] 徐艳玲,申森.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6).
- [8] Rana Foroohar.Why China Works[N].Newsweek,Jan.19,2009.
- [9] [波兰]亚当·沙夫.我的中国观[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4).
- [10] 洪朝辉.“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理论[J].廉政瞭望,2006,(10).
- [11] [美]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J].吕增奎 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9).
- [12] [美]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吕增奎 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8-05-05.
- [18] 罗思义.中国的改开成就中有哪些“世界之最”? [EB/OL].中国智库网,<http://www.chinathink 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3043888>
- [19] 徐康宁.现代化国家、经济增长与中国道路[J].江海学刊,2018,(1).
-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Analysis of Misinterpretation of Socialism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road

WANG Zeng-zhi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China,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ism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day. The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Western scholar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sm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Western free market, such as the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e capitalism, the integration theory, the third way theory, the post-socialism theory, etc. which exerted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 In the new journe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particularly importance to clarify these erroneous views for achieving new strategic goals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Despite the wide use of capital and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logic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the ultimate goal of capital, rather than taking the capitalist road, is to make capital's full play in the process of self-denia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will last a long time and need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abroad; socialism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isinterpretation; analysis

(责任编辑:马建珠)